

广播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新疆广播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

(广播教材)

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说 明

本书是我校委托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写的广播教材。

参加编写的是：刘一新（第二——十四讲），陈坚（第一、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讲）王荣初（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一讲），丁茂远（第三十二——三十九、四十八讲），王国柱（四十——四十七讲）。全书由陈坚通稿。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五位同志，利用业余时间为我校撰写教材，对我区广播教学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新疆广播师范大学语文专修科

一九八〇年一月

目 录

第一讲 诸论	(1)
第一编 “五四”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1919—1927)	
第二讲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 和发展	(9)
第三讲 鲁迅生活和思想发展的道路	(17)
第四讲 鲁迅的小说《呐喊》和《彷徨》	(24)
第五讲 鲁迅前期的杂文	(31)
第六讲 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	(39)
第七讲 郭沫若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46)
第八讲 郭沫若的《女神》	(54)
第九讲 叶绍钧的小说	(62)
第十讲 郁达夫的小说	(70)
第十一讲 蒋光慈的诗歌和小说	(77)
第十二讲 闻一多的诗歌	(85)
第十三讲 朱自清、冰心的散文	(93)
第十四讲 田汉、丁西林的话剧	(101)
第二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1928—1936)	
第十五讲 左翼文艺运动及其功绩	(108)
第十六讲 左联在文艺思想战线上 进行的斗争	(117)

第十七讲	鲁迅后期的杂文·····	(125)
第十八讲	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	(132)
第十九讲	鲁迅的诗歌·····	(139)
第二十讲	茅盾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147)
第廿一讲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	(155)
第廿二讲	茅盾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 《春蚕》·····	(162)
第廿三讲	巴金和他的长篇小说《家》·····	(170)
第廿四讲	老舍和他的长篇小说 《骆驼祥子》·····	(177)
第廿五讲	柔石、胡也频的小说·····	(184)
第廿六讲	叶紫、肖红的小说·····	(191)
第廿七讲	曹禺和他的剧作《雷雨》、 《日出》·····	(198)
第廿八讲	田汉、洪深的戏剧·····	(205)
第廿九讲	殷夫和他的红色鼓动诗·····	(212)
第三十讲	蒲风、臧克家的诗歌·····	(219)
第卅一讲	苏区文艺运动和创作·····	(226)
第三编	抗日战争前期的文学 (1937—1942)	
第卅二讲	抗战前期的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 斗争·····	(235)
第卅三讲	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	(242)
第卅四讲	夏衍、宋之的、于伶的戏剧·····	(249)
第卅五讲	艾青、田间的诗歌·····	(256)
第卅六讲	柯仲平、何其芳、陈辉的诗歌·····	(264)
第卅七讲	丘东平、刘白羽、周而复	

的报告文学·····	(272)
第卅八讲 张天羽、沙汀、艾芜的小说·····	(279)
第四编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1942—1949)	
第卅九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 表及其划时代意义·····	(286)
第四十讲 赵树理的小说·····	(293)
第四十一讲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 《暴风骤雨》·····	(301)
第四十二讲 丁玲的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308)
第四十三讲 解放区的其他小说·····	(314)
第四十四讲 贺敬之、丁毅的歌剧 《白毛女》·····	(321)
第四十五讲 解放区的其他戏剧·····	(328)
第四十六讲 李季的叙事诗 《王贵与李香香》·····	(338)
第四十七讲 解放区的其他诗歌·····	(345)
第四十八讲 国统区的文学创作·····	(356)

第一讲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又称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其间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革命的性质规定了文学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时期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它的性质既不同于五四以前的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也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便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文学运动整个进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运动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因素更加发展，增长。但就整个情况来说，它还是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现实，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基调，从而给予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以伟大的影响。在“五四”前夕，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从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便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它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革命运动中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在他的理论和创作中，对帝国主义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热切的向往，充分流露了推翻剥削制度，砸烂旧世界的革命热情。在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和社会革命论的推动下，鲁迅和郭沫若的创作，则无情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撕毁了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假面，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反映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对刚刚揭开序幕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左翼作家，他们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在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页。鲁迅、茅盾、殷夫等人的作品，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迅速发展和进一步走向成熟。与此同时，还有一批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是很值得重视的，其中成就卓著的如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作品，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抗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愿望。它们适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成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有力的同盟军，发挥了积极的反帝反封建的作用。新文学运动表明，自五四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映，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新文学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新文学运动的灵魂和根本动力。

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通过党的路线、政策来实现的。在各个历史阶段，党根据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这种口号，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动员口号。这是全国人民革命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纲领，也是革命文学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纲领。它有力地推动着文学事业紧密地配合现实斗争，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五四运动时期虽然党还没有成立，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党成立以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提出党的最终目的是铲除私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当前任务。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正是这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了“使文艺无产阶级化”的任务。一九二三年以后，党对文艺界提出“从事实际运动”和创作“革命文学”的号召。一九二七年以后，适应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新的革命形势，一批共产党员作家率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一九三〇年成立了具有明确革命纲领的作家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标志着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已由思想领导进入到组织领导的阶段。由于左联的成立，使得革命的文艺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向国民党反动派作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终于使举世罕见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

败涂地。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上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及如何服务的问题，为无产阶级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文艺路线，从而把现代革命文学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文艺理论，并使它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这是新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党在自己的队伍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理论家，直接地具体地领导了文艺运动，并为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还领导和教育了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培养了新文学运动中的骨干力量，组织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运动的旗手鲁迅，第一个杰出的新诗人郭沫若，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和其他许多优秀作家，都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同时，在文艺思想斗争中，党领导着一切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击退了敌对的和落后势力的进攻，保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从而保证了新文学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党的领导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新文学运动才能通过艰苦复杂的战斗，日益发展壮大，并向着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迈步前进。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贯穿着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发生急剧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五四”运动前后，当新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封建复古主义者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等便大肆宣扬国粹，鼓吹复古，反对文学革命，

向新文学运动作垂死的反扑。以后现代评论派又跳出来反对新文学运动，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对这些反动文学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一九二七年以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家”等配合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对左翼革命文艺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等也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诬蔑无产阶级文学，企图压倒无产阶级文学。抗战期间，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反人民、妥协投降的逆流中，梁实秋鼓吹“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宣扬法西斯文艺理论。在四二年前后的延安，王实味又在“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问题上向党射出毒箭。他们这些人中有的 是公开的敌人，有的以所谓中间派姿态出现，有的还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们玩弄的花招五花八门，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反对革命和革命文艺，与无产阶级争夺文艺领导权。他们否认文艺的阶级性，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企图使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革命，为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服务。

在文艺战线上，除了上述斗争外，在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斗争。如“五四”运动初期“问题与主义”之争，“什么是新文学”之争，抗战时期在民族形式问题上，对两种走极端的形式主义错误观点的批判。文艺上和政治上一样，统一战线里面有着不同的阶级，自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文艺主张。事实表明，这种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运用正确的方法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就能够教育更多的人，达到更广泛的团结，这是有助于文艺运动的前进和提高的。然而，如果一味强调斗争，而且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是不利

于团结广大作家，发展文艺运动的。

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革命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同时又是批判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接受了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而成长壮大起来的。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与形形色色反民族、反科学、反人民的文学流派的斗争中，不断批判继承中外优秀遗产，逐步建设具有新民主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新文学的历史。

我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历代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表现的那种勇于揭露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高度的人民性，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在运用艺术形式和文学语言方面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都给现代作家以有益的启示。“五四”以来的不少优秀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很注意文学创作的民族风格，从古代文学中不断吸收营养。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成为以后文艺工作者自觉的奋斗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学习群众的语言，并有意识地运用我国传统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因而创作了相当完美的民族形式的作品。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我国现代文学也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优点来发展自己。“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为了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曾大量介绍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和文艺作品，如拜伦、歌德、易卜生等欧洲进步文学，波兰和巴尔干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俄国的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的作品。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在从事创作的同时，都是外国文学热情的介绍者和翻译者。

不少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对中国的
新文学发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鲁迅在谈他的创作时便说过：“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郭沫若也说他在开始诗歌创作时受到过外国诗人的影响。这就说明外国文学对现代文学创作所起的良好借鉴作用。凡是成就显著的作家，在熟悉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同时，往往又能精通中外，吸收外国文学的长处，化为已有，从而形成了自己作品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阐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律，总结上述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创作实践的经验，用“五四”以来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斗争经验，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服务。为此，在学习中，在掌握现代文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我们要着重了解：（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整个革命事业的进程的关系。从“五四”开始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是为各个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服务的，它随着中国革命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得到发展。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文学必须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认识。（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斗争的历史特点。革命文学离不开革命斗争的风雨的锻炼。思想斗争的活跃，固然可以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不同观点的争论、交锋，也会充实和丰富作家的思想认识，有利于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点。（三）重要作家的创作成就。我国现代文学虽然时间不长，然而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从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中间，可以探讨作

家创作道路、艺术方法和表现风格等方面的特色，从中吸取艺术经验，以提高今天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质量。

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万恶的“四人帮”曾挥起板斧，大砍大杀，进行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现代文学及其作家作品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和评价，充分地肯定它的历史地位，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拨乱反正，努力把现代文学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上来。

第一编 “五四”到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1919—1927)

第二讲 “五四”文学革命的 兴起和发展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五四”运动以前，一部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发出了掀起一个新文艺运动的呼声。他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同时，提出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这些主张，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胡适着眼的基本上是文学用语、写作态度和文风等形式方面的问题，很少涉及新文学反封建的内容。即使只是在形式方面提出一些改良，胡适也再三声明：

“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表现了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是陈独秀。他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的矛头的狠是对准封建主义的。他不仅反对封建文学“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的形式，而且反对“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的内容。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陈独秀大胆指斥封建文人一向崇奉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大声疾呼：“有不顾迂腐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他针对胡适来信中所说的“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的论点，在回信中断然指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的这些主张，对于打击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学，扩大文学领域内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新青年》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首先起来响应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指出，语言文字是发展演化的，那些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他竭力主张“言文一致”、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我们既绝

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在钱玄同的倡议和实行下，《新青年》自一九一八年第四卷第一号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深信“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主张打破“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她”字和“牠”字的创造，提倡新式标点符号等，对当时文学革命的开展，都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开始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运动也就开始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运动。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正确介绍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接着在《新青年》上发表论文《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这些论文里，他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论述了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意义。同时，开始以唯物史观来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并针对胡适等人宣扬的所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主张，写了《什么是新文学》一文。李大钊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文做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兴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这里的“博爱心”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好名心”的对立语来用的，虽然还带着他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痕迹，但它的含义与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有了不同。李大钊着重指出，新文学为求“花木长